

先达和棉兰的文教报业的锻炼

黄书海不平凡的经历之(一)4

立后,家人已被安排回国。

我们试图寻访陈家父母或亲戚,但无果而终。连“赵豫记”酒厂旧址都找不到。令我们有点沮丧。

林总编在当地侨界有不少熟人。每天应酬不少。我们的活动时而集体,时而分散,各得其所。

武吉丁宜的华侨,爱国热情很高。当地爱国青年,特别是文化教育工作者,为纪念苏岛华侨抗日“九·二〇”事件10周年,于1953年8月在市北郊,兴建了一座纪念碑,以启迪后人永远记住11名华侨抗日烈士,永远反对日本法西斯!他们的正义之举,令我们十分感动。

1947年7月,荷兰发动“警卫行动”,进攻印尼军控制的城市和地区。进攻与反进攻的武装冲突此起彼伏。为了抵抗荷军的进攻,火水山地区的印尼军人采取焦土政策。把好端端的火水山城市和炼油厂付之一炬。许多无喜华侨和华人倾家荡产。四处逃难。

为了加深对这一事件的了解,《民报》组织编辑人员和记者前往火水山就地考察。我也去了。

大火掠过的城市,炭黑一片,满目疮痍。人夜没有电灯。当地印尼人用长水管,插入路边土里,用麻袋布做灯芯。火一点燃,土表里的煤气煤油被吸上来,经久不灭。

所谓火水山,就是盛产煤油煤气的地方。如今已被糟塌得不成样子。昔日的火水山,何时才能重见天日?

50年代初,在我进入报社工作之前,我和瑞玲曾到棉兰丹南看望昔日同学黄石明、李碧玉、蔡达荣、邓新荷、陈素琪等。他们是先达第一批下乡与工农相结合的老师。

丹南因这些老师的到来而生机勃勃。在黄石明校长带领下,丹南的华文教育搞得有声有色,闻名遐迩。当地农工对他们赞不绝口。

我们在丹南留宿一夜。



华文报纸《苏门答腊民报》在苏门答腊岛棉兰创刊

会见了农会骨干和天真可爱的农民子弟。石明说,这里的农工绝大部分是彭辞原来的部下。海陆丰人,性格彪悍、果敢。他们身上许多优秀品格很值得我们学习。

石明还教会我们唱一两首海陆丰歌谣。

相处时间虽很短暂,但他们在丹南的业绩,却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。

1997年,我和瑞玲有幸到广州花县看望石明和碧玉。阔别近半个世纪的重逢,彼此感触颇多。

石明、碧玉50年代回国后,经历坎坷。石明心中最大的遗憾是:始终未能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来先达前,他在新加坡已是马共党员,曾担任先达中华学校学生会主席,能言善辩,常以革命青年或青年领袖的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。

可是,回国以后,他的人党问题一直解决不了。后来,我曾向陈洪提及此事。陈说,“为什么不让他直接找我,我可以为他写证明材料。”我说,晚矣。石明已处于人生边缘,再也没有精力考虑此事了。

石明和碧玉已乘鹤西归,却留下两颗赤子之心在人间。

《民主日报》和《苏门答腊民报》在苏北华侨民主

爱国运动中,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。它们创办的副刊各具特色,深受广大知识青年的欢迎。

在这些副刊上,隔三差五,你就会读到李洁霜使用多个笔名撰写的文章和诗歌,读到张育文(略闻)像涓涓溪水沁人心脾的散文,读到林淑明文采飞扬、把太阳形容为“红丢丢”,极力模仿鲁迅风格的犀利杂文,读到陈达民内容丰富的长篇小说。

棉兰张爱群、李发均、林熔坤、钟勇发……等的文章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。

这一大批作者为繁荣两报的副刊做出了卓越贡献,反过来两报也为他们提供了提高写作能力和施展才华的园地。相辅相成,相得益彰。

1954年中旬,我和瑞玲商量好,准备1955年一起回国深造。八九月份,我向林革尘总编提出,年底我准备辞职回国念书。希望报社尽早物色接替我的人。当时林总未置可否。

10月1日国庆节刚过不久,林总通知我说,中国驻棉兰领事刘亚民约你谈谈。

刘领事知道我要回国念书。他说,念书是件好事,但是现在大使馆急需印尼文翻译,希望我能到大使馆工作。他说,上学是提高,在大使馆工

作,边工作边学习,或许提高得更快,学以致用嘛。

他告诉我,除了我之外,还同时征求杨国坚和卢涵洲的意见。他要我两周后答复。

当时我知道陈丽水、张琼郁、陈文营已到大使馆工作,陈水彪已回国在中联部工作。他们都是印尼文翻译,是我的榜样,也是我的将来。

我已经工作了四年,其时22岁。摆在我面前有两种选择:

第一,回国继续完成高中学业,却年龄偏大;或者经过补习,报考北大印尼文系,但心中没底。

第二,直接到大使馆工作,边干边学,从战争中学习战争,走前辈的路。

几经权衡,我选择了后者。这一选择获得瑞玲和斯刚的支持。

当时,国坚已答应到大使馆工作,而涵洲留下,继续在棉兰嘉沙念英文。

瑞玲已向领事馆申请回国护照。她怎么办?或“留”或“回”,无法定夺,因为我不知道到大使馆后,组织上会怎么安排。国坚却把在棉兰华中念书的女友月明转学到雅加达去了。

为了确定我和瑞玲的恋爱关系,后来成为我的连襟的

陈斯刚盛情陪我去拜见瑞玲的父母。

经过前后两段马车和中间一段火车,我们终于到达西里勿拉湾(Seribelawan)园丘瑞玲家。

父亲林熔妮,母亲罗美庄,还有香玲姐、瑞玲,热情相迎,还备了一桌丰盛午餐。

我们没有按习俗举行订婚礼,也没带任何定情物。席间父亲是谈话的主角。

时而问我的家庭情况,时而问我的工作和将来的打算,但最关键的,他说:“我们把金舍(瑞玲乳名)交给你,希望你能善待她,让我们大家都放心!”

父亲以诚相见,言谈中透着对晚辈的尊重。我对父亲的提问和期望,并没有做海誓山盟,却一一做了肯定答复。从脸上表情看,父母对这个未来的女婿还是满意的。

席间母亲几乎没有插话。她是父亲的二婚,年龄相差20岁。为林家育有三女:郁玲、香玲、瑞玲。母亲生于新加坡,何时移居印尼,瑞玲对其家史也不甚了了。

午饭后,我和瑞玲在家后院一棵柠檬树下,谈情说爱。分别时,我们既没有拥抱,更没有吻别。现在回想起来,似乎不可理喻。

1963年我和瑞玲成婚后,我父亲说,黄林两家才开始相互走动,过年过节互致祝福。我说,结婚后,我对瑞玲父母没有尽过一天孝道,内心总感到有些愧疚。

父亲说,60年代初两位亲家才搬到先达来往。老亲家深谙中医,在先达治好过不少骨折病人,口碑很好。老人家喜欢串门。闲聊时,经常从怀里掏出《民主日报》或《苏门答腊民报》,指着报上刊登的新闻照片说:“这就是我在北京的女婿,他是国家领导人的印尼文翻译。”此时此刻,老人心里充满自豪和欣慰。

这或许就是我在老人有生之年所能给予的一点点慰藉吧!